



雏鹰文库

CHUYING WENKU

学生成长百卷读本

58

社会新景象



中国档案出版社

雏鹰文库——学生成长百卷读本⑤⑧

希 望 工 程

胡昌波 编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目 录

让孩子长大	(1)
充满希望的工程	(5)
希望工程荆楚行	(21)
欢迎仪式缺少“主角”	(25)
浸透大山的情谊	(34)
金盾情系“一助一”	(39)
爱的奉献	(42)
她,献出去的是爱心!	(47)
为了春意盎然	(52)
钟情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	
——记来辉武教授	(62)
书记情系山里娃	(68)
“希望工程”真的开了花	(70)
架设爱的桥梁 铸造共同的信念	
——全国少儿“手拉手”活动红红火火	(73)
昔时百姓送亲人当红军	
今日官兵倾爱心于希望	(77)
情系失学的孩子	
——邯郸市财政局长张顺孔救助贫困	
失学学生纪实	(80)

让孩子长大

北京溪水河小学四年级学生要雯从学校拿回了上学期获得的“三好学生”和“作文一等奖”的奖状。她没有像以往那样“欢呼”，只是静静地把它放在了一边。她觉得，和春节的闽西之行装进她心里的事相比，这已经算不了什么。

看着自家桌上丰盛的饭菜，韩阳想起了闽西贫困户的那顿年夜饭，他对妈妈说：“闽西那儿为什么穷？因为没有路。”这话出自13岁的宝贝儿子口中，着实让当妈的吃了一惊。就是在去闽西的路上，韩阳先是丢了登机牌，又把价值3万多的相机忘在了安检口。

坐在返京的飞机上，日坛中学高二学生曹一楠一直不快活。虽然他又将是这个大都市的孩子，回到了繁华之中，但此时的他已不是彼时的他，他忘不了采访过和没有采访过的生活在贫困中的老区人民，想到他们还将在红土地上度过童年甚至一生，他心中沉甸甸的。

回到家中，杨吟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在闽西的最后几天，她太累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她忙着写稿，急于把所见所闻传递出去，她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起来，又赶着做一件事，给长汀的赖老师写信，实现自己的承诺，参加他们救助特困的行列。她又从自己每月六、七十元的零花钱

中拿出 50 元,帮助一个女孩子,这样自己穿小的衣服也可以匀给她穿。

……从闽西回来,百名首都小记者扶贫采访团的孩子们想着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做着自己认为最该做的事情。他们的父母发现,几天之内,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他们懂得关心别人,变得不那么容易满足,感到接受父母过份的呵护是难堪的,开始考虑自己的责任。这使家长开始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在 10 天前,载着刚从北京来的 18 名小记者的汽车行驶在厦门的马路上,忽然,车内不知是谁高叫起来:“麦当劳!”随即,车内一片欢呼。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孩子熟悉的只有这“麦当劳”。应该说,此时的他们,身后带着一个影子:都市生活的印记。尽管此次活动的主办者,在出发前对孩子进行了集训,对于贫困和此行的艰苦作了详尽的描述;尽管孩子的父母们都喋喋不休地讲述过自己经历的苦难和挫折,但这些在孩子们身上产生的冲击,远没有主办者希望的那样强烈。在孩子们的心中,贫穷和苦难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孩子们对这个概念有着各自的理解。

闽西之行中,带队的老师没有再去反复描绘贫困的残酷,也没有再去强调孩子们应该去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孩子们却自己给贫困做出了定义,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这是因为,孩子们用自己的身心体验了这一切。这体验在孩子们的求知过程中是何等的重要和有价值!我是

个家长，也曾是个知青，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也把自己对艰苦的体验当作一种财富，希望它成为我的孩子成长中的一份营养。当孩子只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故事来听，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我不解甚至气愤。我想，我们这一代，也生活在新社会，可我们为什么对上代经历的苦难就那么容易理解而不这么隔膜？我们在以往好起来的生活中可以毫无抵触地接受艰苦奋斗的教育，而不认为：时代不同了，这是老皇历。或许，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童年，苦难和贫穷离我们尚不远，艰苦本身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是对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或许，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我们的父母把真实的生活交给了我们去体验，而没有像今天的我们，这些在都市里做独生子女父母的成人，把经过包装的生活端给我们的孩子。这就是说，一家的长者都有这样的事实，一家的长者都有这样的心愿：苦谁不能苦孩子。做父母的、父母的父母舍不得用几乎相当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去吃“麦当劳”，可孩子可以尽情地享用；做父母的觉得自己已经吃过苦，而我们的孩子决不让他再受一点委屈。夏天，蚊子还没飞近，父母已为孩子消除了隐患；冬天，冰雪天，孩子不必受挤车之苦，打车送他上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的生活原本如此吗？在克服困难的体验被如此剥夺之后，我们的孩子会不会退化？他们还会懂得什么是困难、艰苦、贫穷？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一位母亲表述过这样一种心情：“我 18 岁时去插队，

艰苦生活的磨炼使我终身受用，但我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我总想我失去的不能让孩子再失去，却没有想到，体验是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像这位母亲一样，我们也开始明白，剥夺了孩子的体验，也就是剥夺了孩子获得真知的渠道和机会，我们在做傻事！

孩子们从闽西回来，失学而渴望读书的女童和危旧的泥屋告诉他们不必向历史去寻找贫困，也不必向未来寻找责任。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贫困与责任同在。中学生曹一楠带回来的收获已不再幼稚，他说：“本世纪末，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有8000万人口没有摆脱贫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就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从完全意义上进入了21世纪。闽西之行使我第一次真真实实、全全面面看到了自己的祖国，使我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使我有了强烈的责任感。扶贫这件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办的，不管我今后做什么，我都会时时刻刻把老区人民装在心里，想到全中国人中还有兄弟在受苦，有困难，还需要帮助。”

闽西之行，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同胞还有好多处在贫困之中，还有好多不能像我们一样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那些贫困的兄弟姐妹也有权与我们一起生活在阳光之下，有权享受党的温暖，他们也要与我们一同长大，将来也要成为建设祖国的主力军。

同是中国的希望，中国在呼唤着希望。

充满希望的工程

希望是几尽绝望的生命的呼喊；

希望是美丽的梦；

希望是人间崇高的爱。

大别山深处，一个为挣学费去砍柴的孩子，不幸落入狼口；一个贫困的流浪儿冻死时手中还紧握着一本语文书，犹如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女孩死后仍握着一把燃尽了的火柴……

河北省的桃木疙瘩村，一个老师只对着两个学生讲课，其余的学生都因贫困失学了。这个古老的不以桃花而以桃木疙瘩命名的村落中最高学历者只是两个三年级小学生，该村距北京仅 180 公里；而此时电脑已走进一些北京人的家庭。

这绝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因贫困失学者 100 万，6—14 岁失学者 300 万，占同龄人的 19% 还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也是一个文盲大国，全世界每 4 个文盲中，就有 1 个中国人。

1991 年 2 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9 名师生在全国 113 个贫困县考察，这些生活在城里的人耳闻目睹了令他们难以相信的事实：

大别山深处，李先念曾转战过的将军村。一位校长指着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妇人对来考察的师生说：“这老婆子命苦啊，40岁才得个儿子，男人死得早。那年秋天，10岁的孩子为了挣学费，瞒着他妈独自到深山里打柴。天黑了，还没回来。村长担心孩子被狼吃了，带着全村人满山去找，最后在一滩血迹中找到孩子的几根骨头和一只血肉模糊的小手。老妇人扔下火把，撕心裂肺地喊：‘我的儿啊我的儿。……’便昏了过去。”

在太湖县台云乡，村长带着师生去看一位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孤身一人四处要饭的失学儿童叶方和。推开他家屋门，空无一人。村长吆喝围观的孩子找。好一会儿有个小孩跑来说：“方和哥在菜地里睡着了，我怎么拉，他也不起来。”村长他们急急地赶到菜地里，12岁的小方和已四肢冰凉地蜷缩在油菜地里，一只要饭的碗扣在他头上，手里还紧握着一本小学二年级语文书。人们想从他手里抽那本书，可怎么抽也抽不动。这情景使人联想到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临死时手里握着烧过了的火柴。

上学——这是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几近绝望的生命的呼喊。

上学——这是改变他们命运的美丽的梦，但贫困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梦。

一个教师走几十里山路，去动员流失学生走向教室。然而，这都是些生活都没有保障的孩子啊。老师大哭不

已,但她能感动谁呢?

首先承担起扼制贫困地区学生流失责任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老师。

湖北省罗田县落梅河乡的教师,每年开学前都要走门串户地去动员失学生上学。那年2月,教师赵建成在寒风中走了30多里山路,敲开了学生江杏春的家门。江父开门时呆住了,门外的赵老师外衣透湿,帽檐上渗出的汗珠结着冰,寒风中抖着身子哆嗦着说:“就一句话,让孩子回去。”汪父哽住了,半晌,突然说:“去,要去,讨米也让他去。”

教师张碧云走访学生江峰家时,看见江父患病在床上呻吟,江母在煮野菜。见到老师,江峰拿出皱皱巴巴的作业本,泪汪汪地说:“老师,寒假作业我做了3遍,可……可没法再上学,交给老师改了。”张碧云接过作业本,心潮起伏。她苦苦求江父母开恩让孩子上学,但磨了几个小时,江父母还是不答应。她急了,说:“峰峰在班里是数学尖子,不读书可惜啊……”说着,她大哭不已。哭得江峰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师:“老师,我家穷,别难为我爸了,作业您帮我改就行了。”张碧云一把搂过小江峰,哽咽着说:“峰峰,别难过,没学费我出,没吃的我给,跟我上学去,好吗?”

面对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情景,天地亦为之动容。

大别山区桐山乡有一名叫胡忠的3年级学生,父亲在城里拉人力车被汽车轧死了。那年暑假,他天天去打

柴,开学时,他背了一包卖柴换得的硬币来交书杂费,可数来数去,还差8角9分钱,他怕学校不让他上学,哇的一声哭起来。老师也哭了,一把拉住小胡忠的手说:“你来上学就是了,别的什么也别管。”

在贫困地区,教师常常不能如期领到工资,但他们又常常为支持贫困失学的儿童上学而垫付书杂费等。湖北罗田县落梅河乡的教师几年来为学生垫付了8万元,占他们收入的一半。其中一位叫朱冬明的教师工作8年,收入8000元,为学生垫付了近6000元。四川一位教师在一年春节来临前给上级反映:要过年了,可我们已有3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但我们几乎每个人又都为学生垫付了200元。200元还不够城里一些“大款”逛趟舞厅的钱,但对年人均收入200元的贫困地区来说,200元就是一年的饭啊。

都说,教师好似蜡烛,贫困地区的教师是一根蜡烛两头点,他们自身既要面对物质的窘困,同时又为良知和责任驱使,为找回大量的失学生,超限度地支付着物质和非物质资料。最令他们痛心的是,在还没有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气象时,却目睹了好学生半途夭折的惨景。

共青团首倡“希望工程”,神州涌动爱潮,中共中央6位政治局常委纷纷解囊,一位为中国改革奔走南方的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为“希望工程”捐款3000元。

国家《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在贫困地区：

——家庭，因贫困而无法支持孩子上学；

——学校，教师的奉献也达到了极限；

——国家，1977年至1987年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为16.9%，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年增长14%和财政支出年增长11.3%的幅度。我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也已尽其所能了。

——那么，社会在教育方面能做些什么呢？

多少年来，中国的社会功能仿佛在沉睡，人们习惯了政府管经济，办工厂；政府管卫生，办医院；政府管文化、养文艺团体；政府办教育，办学校。总之，政府包办一切，人民政府背着大而沉重的包袱。

1989年春，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时，几名干部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青少年的教育事业。经过一番广泛的考察，慎重的研究后，他们提出了“希望工程”计划。

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动员民间团体和人民群众的财力资源，支持贫困地区教育，是一项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解难的社会公益工程。

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

……一名品学兼优的12岁的女生卿远香失学了，她在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时，在考卷末尾，她含泪写上了4个字“我想上学”。在大巴山区有个小姑娘叫王翠华，父母让她退学，她哭着不依，母亲说：“又要读书，又要吃饭，哪有

钱啊！”小翠华跪在妈妈面前哭着说：“只要让我上学，我不吃午饭了。”此后，每天中午小翠华都独自躲在校后的山坡上，饿着肚子望着天空出神，每天中午对她来说都显得格外漫长……

一石激起千层浪，“希望工程”唤起了中国人的良知和责任。在“希望工程”宣布建立1周后，就收到1.8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在80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共青团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所有的到会者都为“希望工程”捐了款。

在边界图门市的邮电局，营业员接过一张汇款单，收款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映入营业员的眼帘，她又把眼光扫向汇款附言：“基金会的同志，钱不多，但这是连队全体官兵的心，愿所有的孩子都拥有美好和幸福的明天。”一会儿，女营业员感动得站了起来，向汇款的青年军官深深地鞠了一躬：“同志，先让我代表那些小孩子谢谢你们！”

那年6月，一位盲人马卫东，凭着一根木棍和一颗爱心，换乘三次车，从北京的香山赶到东城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他的行动感动了在现场捐款的许多同志。

同龄人的命运牵动着同龄人的心，1990年4月，“希望工程”推出“城乡小伙伴手拉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活动，全国数百万少年儿童参加了此项活动，1200个城市与贫困地区结为联谊伙伴。

1991年，“希望工程”收到捐款100万元；

1992年，截止到8月底，“希望工程”收到捐款400

多万元。

这是一个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数额。

“希望工程”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和支持。

中共中央的6位政治局常委为“希望工程”捐款。

已故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为“希望工程”捐款500元，并于1992年“六·一”前夕在中央电视台就“希望工程”发表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接受了台湾龙祥影业公司董事长王应祥请他转交“希望工程”的4万美元捐款后，两次打电话询问此款落实的情况。

已故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最先为“希望工程”题词。

邓颖超同志在弥留之际，委托工作人员给“希望工程”送来了1000元。

徐向前元帅在逝世前不久为“希望工程”留下绝笔——“金寨县希望小学”。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元。

令“希望工程”处的工作人员最难忘的是，1992年6月的一天，两位军人来到他们的办公地点，送来3000元，问捐款者姓名，答曰：“捐款人不让透露。”填写捐款证书时，军人说：“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军人出门后，工作人员也悄悄跟了出去。见他们走出胡同口，又拐出一段路才上了停在那儿的小车。工作人员记下车号，后悄悄地从有关部门证实，这位捐款人就是80岁高龄仍为中国的改革而奔走大江南北的老共产党人——我们的邓爷爷。

海外回响希望之声，凌峰翻车大山中，却感慨流失的学生像是古老黄河流失的泥沙，每一块泥沙都可能长出参天大树。

那年4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活动”，在海外亦产生强烈反响。

1992年4月，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捐款10万元港币，香港鹏利控股有限公司要求资助建2所“希望小学”，随后汇款40万元人民币。

5月台湾星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俊文先生捐款20万元人民币。

6月，台湾信谊基金会同仁捐助8010美元，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会长南怀谨先生捐款50万美元，台湾艺人凤飞飞女士捐款60万元人民币。

1992年，香港演艺界、明报、商业电台、工联、教联在香港设点为“希望工程”集资达300万元港币，澳门青商会教联会为“希望工程”集资达800万元港币。

台湾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凌峰先生首倡的“希望工程”全国巡回义演于1991年10月25日在山东济南拉开帷幕，至今已义演40余场，募捐人民币250万元，建希望小学8所。

这是凌峰在兰州主持义演时的情景：

……伴着“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歌声，凌峰从观众中走上舞台，一曲歌完，凌峰对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甘肃康乐县有个小姑娘叫马阿西叶，今年才8岁，为挣够

每学期 20 元的学费，她每天到砖窑去背砖，而她背 1000 块砖才挣 8 角 5 分钱，小姑娘瘦弱的身躯被沉重的砖压垮了……。此时，凌峰走到台前告诉大家，马阿西叶已来到晚会现场，有了“希望工程”资助，她不用再背砖挣学费了。顷刻间，场上滚过雷鸣般的掌声。

凌峰又介绍了新疆伊宁市的杨绍清女工，她一次就为“希望工程”捐款 1 万元，而她本人却已身患绝症……伴着凌峰的话音，场上出现了抽泣的声音。

去年在由山东平邑到营县为一所希望小学剪彩的路上，凌峰和怀有 4 个月身孕的凌太太乘坐的小车翻了，幸而都未受大伤。从车中爬出的凌峰带着伤对随后赶上的摄影记者说：看来在“希望工程”的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如果人生需要牺牲的话，我将选择这样的牺牲方式。

在目睹了贫困地区学生流失和全国救助流失生的情景后，凌峰动情地说：“流失的孩子就像古老黄河流失的泥沙，是黄土地上流失的希望，每一块泥沙都可能长出参天大树。”

“希望工程”不仅为救助失学生带来了希望，也为共青团工作的发展带来启示和希望，这抑或可以称为“希望工程”之外的希望。

“希望工程”是共青团首倡、全民参与兴学办教的一件实事。当“希望工程”发展至今时，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总结这一活动的意义：运用民间力量，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共青团找到了参与社会发展，符合团组织特征，发挥团组

织能量的一条路了。显然，“希望工程”所以能迅猛地发展，其生命的源泉之一，在于社会民众的支持；其生命发展的后劲，在于共青团成功地探索出了参与社会发展的又一新路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今天看来这是极浅显的真理。社会是检验共青团工作的答案，承认这一点有时略带点痛苦。这几年，共青团在主观上努力为社会和青少年办实事，而 10 多年来像“希望工程”那样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收到良好效益的实事毕竟屈指可数。因此，再思量原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反复强调的团内要反对不正之风，更要反不实之风，更掂出了这话的分量和深意。

共青团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由于年龄要求，团干部任期短，流动快，这既给共青团带来了活力，也给一些团干部产生了错觉，导致了短期行为。有记者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希望工程’何日可告成功与圆满结束？”徐永光回答：“它的成功与结束之日将在 21 世纪的某一天，在中国再没有一位因贫困失学的儿童之时。”这长远的目标，使“希望工程”有了明确的任务和长期的计划。

——参与社会发展，为社会和青少年办实事，克服了短期行为。“希望工程”为改革中的共青团和共青团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并非全新的，但却是富有实际意义的启示和希望。

“希望工程”给中国广大的贫困孩子带来了希望。那